

短論·觀察·隨筆

過度闡釋「公共領域」

● 李金銓

早期中國報業史的研究本來就薄弱，而其中最受重視的莫過於梁啟超及其啟蒙事業，這當然是實至名歸的。對於一些商業報紙，尤其是最老牌的《申報》，史學家尚未公允評價其歷史角色、內容和影響力。所幸海德堡大學漢學系瓦格納 (Rudolf G. Wagner) 教授，主編了《加入全球公共體：早期中國報紙中的文字、形象與城市，1870-1910年》(*Joining the Global Public: Word, Image, and City in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, 1870-1910* [Albany: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, 2007]) 一書 (以下簡稱《加入全球公共體》，引用只註頁碼)，聯合同事和學生做了不少基礎工作，正可填補部分空白。讀者若熟悉他們的研究，當會發現本著作，並未提供新材料，未增添新見解，也未指出新的研究方向。但對一般讀者來說，這仍是一本方便的參考書。作者翻出塵封的故紙堆，從「文字、形象與城市」分析英商梅傑 (Ernest Major) 創辦的《申報》及其名下的畫報，增進我們對晚清上海報業的了解。本書雄心勃勃，企圖論證早期上海報業帶領中國「加入全球公共體」，因此報業必須放在「現代性」的架構裏看待。

全書由五篇長文構成。開首一章是梅嘉樂 (Barbara Mittler) 取材自其舊作《為了中國而誕生的一份報紙？上

海新聞媒體的權力、認同與變遷，1872-1912年》(*A Newspaper for China?: Power, Identity, and Change in Shanghai's News Media, 1872-1912* [Cambridge, MA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2004])，說明現代中國報業每每援引歷史典故與儒家價值，以「馴化」其西方源頭，強化本身的正當性，並刻意與傳統的邸報劃清界限。第二章由費南山 (Natascha Gentz) 分析港滬報業先驅的社會網絡，發現他們背景相似，彼此熟悉，以王韜為圈子的中心。王韜的《循環日報》得到香港商人階層支持，一直保持改革的論調，並鼓吹儒家的精神；英商的《申報》是徹頭徹尾的商業報，一面宣稱效忠清廷，一面暴露政府的腐敗劣迹。港滬雙城，南北輝映，乃英國勢力與西潮東漸的橋頭堡，對中國報業史具有深遠的意義，未來必須展開更有系統的研究。第三章，《點石齋畫報》本無籍籍之名，瓦格納卻把它提升為「加入全球想像體」的橋樑。他賦插圖與文字以同等地位，指出畫報展現外國人筆下的中國，從而擴展了中國讀者的視野，促使中國認識自己及外在世界。沿着一條思路，在第四章中，金蘭中認為《點石齋畫報》介於有趣與驚悚之間的「獵奇內容」，為上海這座都市的陌生人提供娛樂，建立感情的聯繫。最後一章，葉凱蒂分析娛樂小報：它們圍

繞滬上名流與名媛打轉，向為知識人所不齒，但作者卻賦以崇高的文化意義，慨言娛樂小報間接折射大都會生活的病症，「為建構中國的公共領域及其多樣性踏出重要的第一步」（頁227）。各篇書寫大致堪稱流暢，但描述報紙的內容未免太瑣細。

本書受到哈貝馬斯（Jürgen Habermas）「公共領域」概念的啟發和主導。瓦格納指出：「在中國的公共領域中，國家仍擁有響亮的話語權」（頁2）。「國家、社會和不同群體，依照文化和歷史界定的理性與合適規則，表達利益與觀點」，這個空間即是公共領域（頁3）。瓦格納認為，十九世紀晚期上海的公共領域有三個特性，一是超越國界，二是異質性強，三是高階與低階相互雜糅表達種種論述（頁4）。哈貝馬斯描述西歐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發展是和國家逐漸剝離、對峙的，本書卻有意使中國公共領域的發展軌跡與西歐經驗分道揚鑣，力圖證明1870至1910年上海就出現了生動的公共領域。上海有沒有出現「公共領域」？「公共領域」的定義如此浮游鬆散，我們只能說「有」時容易「無」時難了。假如滬上娛樂小報刊載名流的「每日西洋景」也在公共領域之內，我們簡直無法猜測還有甚麼話語是在其外或是無關宏旨的了。嚴肅的信息報和低俗的故事報這樣攪在一鍋，只有蒙蔽而非照明歷史的面貌。

其實，十九世紀中國的精英階層看的是《京報》，《申報》一直轉載《京報》，有時甚至超過四分之一篇幅。十九世紀末，普利策（Joseph Pulitzer）的《紐約世界報》（*New York World*）銷路達60萬份，赫斯特（William Hearst）的《紐約新聞報》（*New York Journal*）達45萬份，這時《申報》的發行量才不過一萬份。林語堂在其英文著作《中國報業與輿論史》中分析了1930年代的

上海報業，批評最老牌的《申報》「編得很濫」，最暢銷的《新聞報》「根本沒編」，而市井小報只是「蚊報」。他對《大公報》的專業精神推崇備至（Yutang Lin, *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* [Chicago: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1936], 141）。然而，在海德堡學者的眼中，只要進入他們研究的範圍，無論《申報》還是流氣的市井小報，從1870年代開始便已經引領中國的現代性，也是公共領域的化身。他們以今視古，削足適履，拿歷史材料去迎合整齊劃一的概念，而不是在具體的歷史情境中考察報紙。

面對各種紛然歧異的解釋，究竟以何種解釋為準？本書雖未明言，但卻沾染了後現代的色彩，有意無意間扛着顛覆正統、邊緣戰鬥的旗幟，以致抹平中心與邊緣、雅與俗、高眉與低眉、深刻與膚淺的種種界限；於是，作者給邊緣者以權力，將默默無聞的東西浪漫化，為流行事物披上理想的假相。筆者不敢質疑他們的美意，但深恐全書的論斷有如空中樓閣，沒有堅實的證據支持，禁不起風吹雨打。

在方法上，作者採取甚麼措施，避免過度闡釋？他們描繪報紙的內容可謂鉅細無遺，卻見樹不見林；堆砌細枝末節，卻有結論在先，只能借助跳躍的推論「證實」信條。我們即使同意瓦格納認為《點石齋畫報》「與西方的畫報聯接」的觀點，但他接着說：「〔它〕將中國整合到全球範圍的審美議程，以及〔進入〕全球形象交換的過程」（頁156），不論證據與邏輯都付之闕如。倘若《點石齋畫報》帶中國進入「全球想像體」，這是怎樣發生的？上海的尋常畫報是如何被全球公眾接納的？而所謂的「全球整合」，是刻意的行動，是無意的後果，還是作者一廂情願的（過度）闡釋？同樣，葉凱蒂在

研究私窺的娛樂小報之餘，主張「公共領域應該界定得更廣，娛樂有其正當的位置」（頁205）。這是個人的觀點，還是紮根於史實的論斷？她始終沒有說明娛樂在公共領域的位置是甚麼。這類民粹式的抽象概括，信口開河，比比皆是。相比來看，李歐梵在《上海摩登》(Shanghai Modern: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, 1930-1945 [Cambridge, MA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99]) 一書中的結論要溫和謹慎多了。

《加入全球公共體》描繪報紙內容頗為詳盡，但論斷卻相當粗率。在筆者看來，與其將中國報業史塞入「公共領域」的宏大敘事，不如退一步發展墨頓(Robert K. Merton)所提倡的「中距」(middle-range)論斷，以聯繫媒介文本到晚清上海乃至中國的政治、經濟與文化脈絡。上海固然位居中國現代性的中心，但畢竟是一座半殖民地的「孤島」，被中國社會、人口與文化的汪洋大海所包圍。試問這個混生的角色對其報業生態有何涵義？更重要的一點：如果單純解釋報紙文本，而不分析受眾特徵，探討他們如何闡釋文本，則未免給作者太多自由，太少紀律，猶如脫韁之馬無所顧忌。第一手資料也許難覓，但作者至少應該旁敲側擊，檢視二手材料和佐證，刻畫出各種閱讀社群如何解讀報紙文本。忽略受眾分析，浮游無根，一味誇誇其談，實在很難回答「公共領域」的棘手問題。

鑒於《申報》只賣一萬份左右，我們必須問：上海報業是否深入影響全中國各角落和各階層？當時知識階層和草根階層怎樣看待《申報》？知識階層是不是意見領袖，充當報業與大眾的橋樑？根據李孝悌在《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，1901-1911》(台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1998)的細緻研究，清末民初的報紙讀者大致是

中上層，至於下層社會的啟蒙還是大量靠傳統文化的形式(如演說、戲曲等)。這些問題尚待細緻探討，不能簡單地想當然耳。早期芝加哥學派社會學家布魯墨(Herbert Blumer)發現，在經濟大蕭條時期，新移民對電影趨之若鶩，他們逃避殘酷的現實，短暫陶醉於富貴豪門的生活幻象，是謂「替代式的參與」(Herbert Blumer, *Movies and Conduct* [New York: Macmillan, 1933])。這種洞見是否適用於上海的娛樂小報？《申報》與畫報屬於同一產權，其讀者重疊、文化趣味、財政資源，乃至人才交流等情況如何？讀者群錯開，這是代表社會階層的分化，還是出於《申報》針對市場區隔的設計？上海在西方殖民主義、全球資本主義和中國追求現代化等三股力量激盪下，躍身為世界都會，要了解上海報業的結構、內容與受眾，終必聯繫到這個大場景才看得真切。最後，本書大言炎炎，但有何證據讓我們看到公共領域的運作，看到不同社會階層圍繞公共議題活生生展開理性對話，求同存異，而且報業又是其中的場域、調解者、仲裁者或議程設定者？這是眾聲喧囂，還是化對話為公共行動？

本書主編瓦格納說，要是缺乏豐富的歷史研究，寬泛概括的根基必定薄弱。其言甚是。本書宣稱為「強化這一根基」而努力，它解答了一些問題，卻帶出了更多問題。海德堡研究小組宣稱「壽終正寢」，故本書是絕唱。我們要感謝他們，並表達一絲遺憾，但願他們播下的種子結出更豐碩的果實。但下一次必須從歷史的另一端着手，探究一系列的「中距」問題，不要硬把歷史塞進宏大理論的緊箍咒。

李金銓 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講座教授